

〔美〕菲歇尔著

利息理論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利 息 理 論

(美)菲歇爾著

陈 彪 如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年

IRVING FISHER
THE THEORY OF INTEREST

The macmillan Company
New York 1930

根据麦克米伦公司 1930 年版译出

利 息 理 論

[美] 菲 歌 尔 著

陈 彪 如 译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 绍兴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14 1/2 插页 1 字数 308,000

1959年12月第1版 1963年1月第2次印刷 印数 2,601—3,600

统一书号：4074·283 定价：(十三) 2.45 元

封面设计：任 意

譯者序

欧文·菲歇(1867—1947)是现代美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的教授。他一生著作很多,主要是关于资本、收入和利息方面的。他研究这些问题,并不求对经济现象获得科学的认识,只是想用诡辩方法来粉饰资本主义,而掩盖其剥削掠夺的本质。1906年他的第一部著作“资本与收入的性质”问世,在这本书里,他根据时间因素来区别资本与收入。他硬说,资本是在一定时间内的财富存量,而收入则是财富的流动,即财富在一段期间内所提供的服务。例如房屋是资本,而房屋所给予的服务或货币租金就是收入。这样一来,他就完全阉割了经济范畴的阶级内容,把经济范畴说成是与生产方式无关的东西。一切财富都是资本,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包括人类本身在内,于是资本变成事物的固有属性,而与社会制度无关了。既然一切财富都是资本,而一切收入都来自财富,这就混淆了社会收入的真实来源,并把剥削阶级的收入“合理化”了。因此,菲歇尔制造了一套定义把他的理论伪装起来,这不只是概念问题,而且含有最恶毒的意图,即竭力掩盖资本与收入所反映的社会关系及其最本质的特征,来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进行辩护。显然,这种手法是没有用处的,因为马克思早就揭露了资本的实质,他科学地证明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收入并非来自一切财富

的服务,收入的来源只有一个,那就是劳动人民所創造的价值。这一真理是无论如何掩蔽不了的。

菲歇尔还認為,資本与收入間的桥梁或联系就是利率,因为資本是一切資本化的收入,而收入的資本化要取决于利率。这样,他就把决定性的作用强加在利息的头上。为了建立一个完整的理論体系,他在1907年又发表了第二部著作“利率論”,这本书和前书是姐妹篇。在这本书里,他并不首先确定利息的真正性质,也不从資本主义的剝削关系中去探討利息的来源,却想混淆视听,以現在財貨比将来財貨更有价值的荒謬論点来解釋利息現象。在他看来,利息既不是收入的一部分,也不是剩余价值的轉化形态,又不是給高利貸者的貢賦,而是現在財貨的价值和将来財貨的价值之間的差額。他認為,由于人們对現在財貨和将来財貨的主觀評价是不同的,一般都是重視現在而貶低将来,如果把今天的100元放在天平的一端,又把明天的100元放在另一端,那么今天的100元要比較重些,为了保持平衡,就得在另一端加上百分之十,利息就是为补偿現在財貨和将来財貨的价值之間的差額而产生的。非常明显,他是祖述龐巴維克的“貼水說”,只不过增添了更为虛伪的辯护性质而已。然而这一說法是如此的荒誕无稽,它是騙不了任何人的。誰都知道,財貨的价值是由社会劳动所創造的;所以,不論是消費資料也好,生产資料也好,現在財貨也好,将来財貨也好,都有其客觀的标准(客觀的社会劳动),絕不因个人的主觀評价而发生变化。而且,每个人的主觀評价,一开始就是以一定的客觀标准为依据的。

1930年,他又把“利率論”改写了一遍,以“不耐說”代替以前的“貼水說”或“時間差异說”,以“投資机会”代替“生产力”,并补充

了一些新的材料，改名为“利息理論”出版。他在这部書中說明利息的产生是由于两个因素：一是心理的或主觀的因素，即“人性不耐”；另一是客觀的因素，即“投資机会”。利率的决定，就是这两个因素自由反应的結果。在这里，“人性不耐”也就是現在財貨优于将来財貨的时间偏好，所以他的利息理論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罢了。可是，如果我們由此認為菲歇尔不过是又一个庸俗經濟学家，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那就錯了。事实上，他集以往資產階級利息学說的大成，在資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讓我們先分析一下菲歇尔所謂利息的主觀因素——“人性不耐”。他是极力強調这一方面的，他說：“沒有时间偏好就絕不能有現在与将来的任何交換，即不能有任何的利率，正如同沒有人类的欲望，也絕不能有任何交換一样。”所以利息是“人性不耐”的結果。果真如此嗎？

用“人性不耐”來說明利息的起源与性質，首先，这在方法論上是极大的錯誤。第一，他不是从现实的生产关系出发来考察利息問題，而是从抽象的人类心理状态来解釋利息現象，即把他所謂的人們宁愿現在获得財富而不愿将来获得財富的不耐心情作为利息的基础，这就使他的利息理論完全陷入主觀唯心主义的泥坑，除了为資本主义剝削的永恒性进行辯护以外，与现实經濟是毫无关联的。第二，他是他所幻想出来的孤立的个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从而抹杀了人的社会性和階級性。他把个人看作是脱离社会而存在的，似乎人的經濟行为是可以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的。十分自然，在那样孤立的个人的經濟中，是不会有剝削的，也不会有对抗性的矛盾的。然后，他把从个人出发研究所得的結果，应用到具体

的社会經濟現象，于是資本主义剝削就在庸俗的魯宾遜寓言中消失了，資本主义社会的一切对抗性矛盾也就变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反科学的、超历史的方法，不能把握现实、說明现实，是显而易見的。不錯，社会是由許多个人組成的，但它不是个人的累积。在由許多人組成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必然发生一定的关系，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种社会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不同的社会組織形式，具有不同的社会性质，在不同性质的社会里，利息所反映的社会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方法論，不可能了解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不可能解釋任何社会經濟現象。

其次，从內容上講，菲歇尔的“不耐說”包含两条基本原理：（一）每个人的不耐程度决定于他的收入；（二）每个人都这样調节他的收入，以便获得“最大量的欲求”。他的“不耐說”以及全部利息理論的真正价值，就决定于这两条原理能否站得住脚。

菲歇尔从“人性不耐”出发來說明利息，把社会的現象看成心理的状态，把客观的事务化为主观的感觉，并由此得出結論說，利息是不能根除的，于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經濟范疇就成为永恒不变的东西了。并且，为了巩固他的理論基础，他还把个人的收入情况看作是形成利息和决定利息的主要原因。似乎个人收入的不同造成不耐程度的高低不等，而不耐程度的高低不等引起了借貸行为，从而产生了利息。毫無疑問，这完全是一片謊言，全套把戏在于达到以下各种目的：

（一）从收入引伸出“人性不耐”，再从“人性不耐”引伸出利息，企图制造一种錯覺，仿佛利息不是剝削收入，借此来掩盖資本主义的剝削实质。可是这种經濟騙术是无济于事的。如果說不耐决定

于收入,那么收入又是怎样决定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就不敢进一步去分析了,这正是他的利息理论的根本弱点。我们知道,社会收入的分配关系是决定于生产关系的,离开生产就无从说明收入与财富的分配,也无从理解利息的本质,所以关键就在生产过程。然而菲歇尔极力回避关于生产的分析,极力想把利息和生产分割开来,就是为了掩盖利息的真正来源,为了使剥削正义化。

(二)他企图彻底混淆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利息,把这些利息说成是一种没有区别的同一意义的利息,以便抹杀利息的客观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其实,现代的借贷利息既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利贷利息,更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息,它是产业资本家因取得贷款而付给货币资本家的一部分利润,它的来源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菲歇尔采取鱼目混珠的伎俩,用意何在,是不难看出的。

(三)把借贷资本的供给解释为资本家的“等待”,而利息就是资本家因“等待”而获得的公正报酬,用来对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菲歇尔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工人应获得他的全部产品,这个命题是不正确的,因为工人没有“等待”,他不能在现在获得他的产品的全部将来价值。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诡辩方法。财货的价值怎么会因“等待”而有所增加呢?无须证明,“等待”根本不创造价值,而且也不可能创造什么。如果“等待论”可以成立的话,那就是说,在停止生产的情况下,也会有社会财富产生出来,这岂非是天下奇谈。在这里,菲歇尔妄想偷天换日,用“等待论”来代替劳动价值论。他一方面强调资本家的牺牲,从而要求对这种牺牲支付切实的补偿;另一方面又极力攻击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然而真理是驳不倒的。伴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而来的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大

量增加，資產階級的揮霍浪費也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在這種情形下，說什麼“等待”的犧牲，再沒有比這種神話更荒謬的了。

（四）他還根據“人性不耐”決定於收入的論點來對經濟落後的國家進行誣蔑，並替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作公開的辯護。舉個例子，他硬說我們中國利息之高是由於經濟貧困和政治不穩定的關係，這種倒果為因的說法，十分明顯地暴露了他的反動本質。人所共知，舊中國的貧窮是三大敵人殘酷剝削的結果，而高利盤剝不過是這種殘酷剝削的一種形式而已。

以上我們揭露了第一條“不耐”原理的實質，現在再看看他的第二條原理的虛偽性。

菲歇爾的“最大量欲求”原理，是以計算苦樂而獲得最大量的滿足為根據的。這一原理的哲學基礎就是承認追求快樂和避免痛苦是人生的唯一的目的，人的行為的是非標準在於能否增進個人的快樂。這裡充分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庸俗性和反動性。首先，這一原理是以臭名遠揚的邊際效用說為依據的，照他的解釋，所謂“人性不耐”就是現在財貨優於將來財貨的時間偏好，而現在財貨優於將來財貨的時間偏好率或不耐程度就是直接從對於現在財貨和將來財貨的“邊際效用”計算出來的。我們知道，邊際效用說不僅是反動的，而且是完全脫離實際的。它所要解釋的是個人在消費過程中的心理感覺，儘管消費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事實，然而經濟科學所需要說明的，不是人們在消費過程中的心理狀態，而是滿足消費的物質條件，脫離了具體的社會經濟條件來談人們的欲望或主觀的效用，那只是幻想，與現實社會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其次，它完全抹殺了快樂與幸福的階級性。在階級社會里，不同的階級有其不同的快樂與幸福，資產階級的快樂和幸福與無產階級的快樂和

幸福是根本对立的，絕對没有什么一般的、超階級的幸福与快乐。再其次，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購買一包香烟或添置一件衣服时，并不是根据快乐主义的計算法。根本无法計算某种財貨所产生的滿足，也无法比較一元收入在不同时期所給与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計算，就是現代資產階級心理学家也不能不承認这一明显的道理。况且，在資本主义殘酷的剝削与压迫下，一般人民那里談得上快乐与幸福。由此可見，菲歇尔所鼓吹的“最大量欲求”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騙局。

从上面的分析看来，菲歇尔的“不耐說”是最露骨的唯一論，毫无科学根据。他捏造这一絕對虛偽的学說，只是为了掩盖資本主义利息的真实性质来为壟断資本服务。

現在我們再来考察菲歇尔所謂利息的客观因素——“投資机会”。

菲歇尔的“投資机会說”，是从德国經濟学家杜年与美国經濟学家克拉克那里抄襲来的。他为了摆脱有关生产的任何想法，还別出心裁地发明了“投資机会”这一名詞，用来代替旧的、破产了的“生产力論”。他断言，每个人都可利用他的資本来取得收入，而資本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用法，由一种用法改变为另一种用法，叫做“投資机会”。人們可以在一系列的选择中，运用投資机会为其資本选取最好的用法——提供最大量的現值。这一虛构的学說集合了各个时代庸俗經濟理論的一切詭辯，可以說荒唐到极点了。我們从以下四方面来加以批判。

(一)我們从今天資本主义世界的具体情况来看，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菲歇尔的“投資机会說”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在現代資本主义条件下，投資与生产停滞的趋势是很明显的，这是由于壟断

的統治和市場問題的尖銳化。壟斷組織為了限制產量，保持壟斷價格，就一面阻止別人在該企業的投資，而同時自己也不肯繼續投資、擴大生產。另一方面，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與壯大、資本主義各國人民群眾的日益貧困、經濟落後國家內資本主義的發展、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漲，都促使市場問題更加尖銳化和複雜化。在這種情形下，還談得到什麼資本的自由移轉，投資機會的自由選擇！即使在菲歇爾所假定的完全競爭的條件下，依極微等級而進行的“投資機會”，也是不存在的。

(二)杜年等的“生產力論”不敢完全抹殺生產，龐巴維克的“貼水說”則認為生產是一種補充的因素，菲歇爾則還要后退一大步，想把生產從利息理論中徹底清除掉，所以他極力攻擊龐氏關於迂回生產多產性的論點，其用意是說，生產不是獨立的因素，生產影響收入，收入影響“人性不耐”，而“人性不耐”決定利息。這樣一來，生產就淹沒在他所謂的“人性不耐”中了，這就是他的“投資機會說”的真髓。因此，菲歇爾對他的前輩的學說的修正，只足以加強他的理論的欺騙性，並不能改變其反動的實質。

(三)菲歇爾用微分計算(連續函數的微小變化)的極大極小的概念，來說明投資所提供的“最大量現值”對利息的決定作用。不消說，他所謂“最大量現值”是以“邊際生產”為依據的，而“邊際生產”也就是某種生產要素的邊際單位(追加的最后一个單位)所創造的生產物。在菲歇爾的眼光中，一個農場主可將土地耕種到任何的深度，他將不斷追加投資，一直到“邊際生產”等於市場利息為止，這也就是他所說的“邊際收穫超過成本率”等於利率，這時他的將來收入的現值是最大的。“邊際生產”是資產階級經濟學里庸俗透頂的傳統觀念，它的主要目的在於證明：若干生產要素共同組成生

产过程,劳动只創造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劳动边际产品”),而其他部分是由資本和土地所創造的,因而任何剝削是不存在的。根据这一辯护性謬論,資本是有其固有的財富創造力的,好象它能单独发挥作用。如果当真如此,那么利息就應該由那沒有与工人相結合的資本所創造的生产物来决定。可是資本沒有工人的劳动,什么也生产不出来,这是鉄一般的事实。退一步講,如果工資决定于“边际”工人以最低生产率而劳动时所創造的生产物,在这种場合,除“边际”工人以外的一切其他工人所拿到的就要少于他所創造的,剝削依然存在。由此可見,菲歇尔輩的庸俗观点漏洞百出,他們想推翻資本主义剝削事实的狂妄意图,必然遭到可耻的失敗。

(四)他所謂“投資机会”是以“生产递减律”为前提的,即投資不断增加,追加投資的生产則逐漸减少。这一捏造的規律就是声名狼藉的“土地收获漸减律”的推广。关于收获递减的說法,列宁在“土地問題与‘馬克思的批判家’”一文中曾給予毁灭性的打击。这一說法的根本錯誤,在于假定生产技术不变,因此它是“最沒有內容的抽象”。事实上,追加投資的目的,一方面是要扩大剝削量,另一方面就是要节省劳动、降低成本,从而获得更多的利潤。所以一般說来,新的投資总是在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投資增加时,往往引起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收益的提高。就整个資本家階級来講,总是在預期可以因追加投資而提高或者至少維持現有利潤率的情况下才进行追加投資的。可見,投資增加、生产递减的說法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总之,为了适应壟断資本的特殊需要,庸俗經濟学中最反动的东西,菲歇尔都小心翼翼地繼承下来了。他的“投資机会說”絲毫不含有客觀的因素,它在實質上是极端唯心的。但唯心的理論最

难捉摸,为了使它具体化和明朗化,以便具有更大的欺騙性,他还应用了数理分析,于是他所杜撰的“投資机会”演变为“机会曲綫”。既然所謂“边际生产”和“收获递减律”純属虛构,那么,由此推演出来的“投資机会曲綫”当然不能成立。这种概念的公式化,不只是叙述方法的改变,同时也表现了資产階級經濟学的危机,它日益变成沒有內容的数学游戏,除了加深理論与实际脫节外,只是起了一种思想魔术的作用。

以上我們简单地批判了菲歇尔体系中决定利息的两个基本因素——“人性不耐”与“投資机会”,他的整个利息理論就建立在这些謬論的基础上。他認為,“人性不耐”与“投資机会”这两个相反的力量是同时发生作用的,作用的結果是要趋于平衡,最后利率决定于平衡的一点,在这一点上,所有“边际時間偏好率”与所有“边际收获超过成本率”都等于利率。这完全是空中樓閣。第一,根据上面的分析,所謂“人性不耐”与“投資机会”在理論上沒有根据,在实际上也不存在,那么,这些虛无飄渺的东西怎么能够决定利息呢?第二,单就分析方法來講,菲歇尔的平衡論是一种靜态均衡的思想。但在一个迅速发展的世界里,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的运动中,也只有在运动中才能認識它、理解它,所以靜态分析的結果,必然是与现实生活相抵触的。面对着鉄一般的现实,菲歇尔不得不承認,他的理論只是說明一种傾向,在现实社会中,理想是永远不会达到的。实际上,資本主义社会的利息水平,并不是由他所描述的那种方式来决定,而是由借貸資本的供求关系来决定的,特别是由現行利潤率的高低来决定的。現在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他发表了一大套錯綜复杂的議論,只是抽象的空談,其真实目的在于迷惑讀者,歪曲利息的实质,为壟断資本作思想上的辯护,我們必須彻

底粉碎它。

随着資本主义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表面化和尖锐化,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响了,它完全脱离了合理的科学基础,变成替資本主义說教的詭辯,菲歇尔的利息理論充分証明了这一点。我們在这里不能对它进行全面的批判,只能簡單提出几点以供参考。本書如有誤譯及用詞不当的地方,还望讀者指正。

陈彪如 1959年8月4日

原 序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因筹措战费以及战后的赔款、复兴及工商业的重建而引起惊人的信用膨胀，使经济学家和生意人又重新注意资本主义以及利息的性质和起源等问题。所以本书是为金融界、实业界的领导者以及经济学教授与学者们写的。

战时与战后的通货膨胀造成物价的暴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率远远跌到零下，从而使许许多多的投资人陷于穷困的境地。在所有的国家里面，由于货币变动对实际利率的影响，收益固定的头等证券变得带有高度的投机性质。大战以后，各国人民寅吃卯粮借钱化费的焦躁心理，加上获取大量投资报酬的机会，使得利率提高并保持在高度的水平上。国民收入的增长使美国成了一个债权国。在国内，由于新的科学、工业与农业各方面的革命，实际收入获得了惊人的增长。1920年后，利率曾有稍许下降，但是因为投资报酬还是很大，所以利率仍然是高的。人们急于花费的不耐，可拿消费者信贷组织作为例证。这种组织是采取金融公司的形式特别设立起来的，它的目的在于适应和鼓励分期付款的赊卖并求得消费的标准化和稳定化。

“利息理论”这本书的写作，初意在于修订“利率论”，后者发表于1907年，久已绝版。读者时有重印该书的请求；但我却一年年地拖下来，拖了20多年，因为我希望修改一下表达的方法，并根据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把该书中不为人所理解的部分，加以重写。

对“利率論”一书的批評意見，凡是看到的我都考虑过了，因此这一次，我对表达方式做了重大的改变。虽然实质上我的利息理論簡直沒有絲毫的改变，但是把它闡述得如此詳尽、写法上如此改动，所以我想从前誤解我的“利率論”的人会比我感到变动得更大。把这一本书完全从新改写，并补充了新的材料，結果“利息理論”成了一本新的书。

这本有关利息理論新解說的写作，曾得到許多經濟学家和商界知名人士的鼓励，特别是出席凡尔賽和平會議的英国代表之一O.T.法克先生。法克先生很恳切地說，他从“利率論”一书所获得的对經濟理論的深刻理解要多于从其他任何一本书所得到的。

“利率論”发表后若干年，我曾建議用“不耐”这一比較通俗的名詞来代替“貼水”或“時間偏好”。这一新名詞得到广泛的采用，但出乎我意外的是，它竟引起一种普遍的、錯誤的想法，以为我完全漏掉或忽視了生产力或投資机会方面。它又使許多人认为，我之使用不耐这个新名詞是意味着提出一种新的思想。于是我发现我被称为“不耐說”的創始人，其实我不是的；而缺少新名詞来表达的另外一些思想却又不算是我創始的了。正是由于这种誤解，才促使我在探索多时之后采用“投資机会”这一新名詞来代替“生产力”这一通用的然而不适当的名詞。^①

① 投資机会这一名詞看来是通俗話中最接近于表示本书所用的技术量 γ 的一个名詞。 γ 的全名是收获超过成本率，其中收获与成本是比較两个任意收入川流所得的差数。就我所知，还没有一个利息問題的作者使用过收入川流及其差数，或收获超过成本率这些术语。最接近于这一用法的好象是H.J.戴文波教授，特别是他的“企业經濟学”（紐約，1913年，麦克米伦公司）第368、379、381、394、395、396、410、411頁。